

## 专题

← (上接5版)

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,如何解决交叉、通读、发稿、附录以及插图等具体问题。为了充实辞海编委会的力量,陈望道将外地一批参与《辞海》修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增聘为编委,建立主编负责制——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,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,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。

1961年,《辞海》(试行本)陆续出了16本分册,辞海编辑所派出工作组赴各地征求学术界的意见。次年8月,“试行本”进入修改阶段,编印了60册内部使用的试排本,每个条目前都注有主稿和会稿的学科代号,以便处理交叉问题。据初步统计,这是在《辞海》(1989年版)面世前收词最多、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稿本。1963年夏天,试排本基本改定,等待少数政治性条目的审查,在严峻形势下,有关方面决定《辞海》先以“未定稿”名义出版。后来编委会又召开定稿复查会议,被迫站在“左”的立场进行大量删改。1965年4月,历时8年编纂的“未定稿”上下卷出版,全书收词98000条,样书在第一时间被送往上海和中央各部门。杭苇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,“反应很好,评价很高”,但仅仅几个月后,《辞海》就被定性为“毒草”——“字字都是黑的”。

### 客观上承担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

——1979年版

《辞海》(未定稿)的编纂修订不可避免地受到“文革”阴影的笼罩,直到周恩来总理下达了再次修订的指示。1972年,在《关于修订〈辞海〉的报告》通过后,上海人民出版社组建了辞海编辑室,成员主要来自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、上海人民

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等,同时工宣队与军宣队也一并进驻。除了出版一册不涉及政治内容的《辞海·生物分册》(1975年)外,辞海编辑室在“文革”结束前的主要工作是批判和再批判,也就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出版成果。

1978年1月,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名上海辞书出版社(下称辞书社),社长束纫秋邀请夏征农担任《辞海》新主编,理由是这位老领导思想解放、放得开手脚,也压得住台。在准备编纂《辞海》(1979年版)时,大家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,选择以哪个版本为基础——1965年的“未定稿”还是“文革”中的“修订稿”?夏征农的态度很明确:“修订稿”是极左路线的产物,应该采用“未定稿”。但是如何处理“阶级斗争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及与国民党、台湾有关的词条?“坚持实事求是,尊重客观事实。”夏征农带头对辞书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的《〈辞海〉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》表示了态:“如果有错误,我这个主编负责。”

重新打造的编纂团队可谓群星闪耀,郭绍虞、朱东润、钱仲联、冯契、周予同、周谷城、谭其骧、李春芬、夏鼐、顾廷龙、费孝通、钱伟长、苏步青、李国豪、谈家桢、谢希德、俞振飞、裘沛然……几乎所有学科门类的顶尖专家都被邀来参与工作,贡献自己的劳动与智慧,如此强大的资源调配放在今日来看是不可想象的。为了顺利完成中央和上海交给的任务,也为了满足人民压抑已久的知识需求,辞书社向人民社、科技社、文艺社等兄弟单位借调编辑和校对人员,夜以继日、埋头苦干,终于赶在国庆30周年前夕出版了《辞海》(1979年版)三卷本,总条目106578个,共计1300余万字。激动之余,有人填词一阙:“引名言,文章立;天下事,皆罗列;知识库,海中觅。赖中央领导,四方同力。祖国专家齐献宝,友邦名士争先阅。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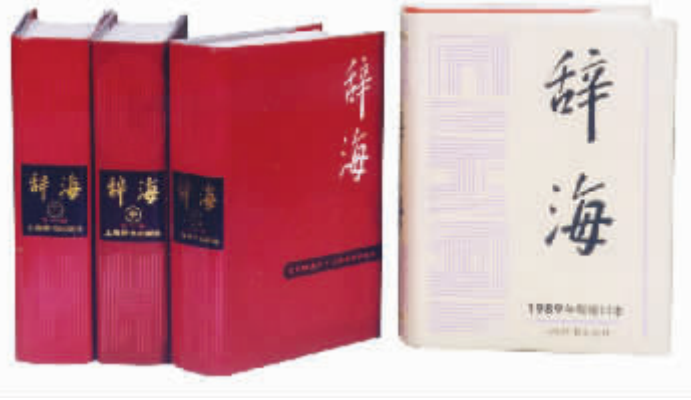
洛阳纸贵,乘风行,飞南北。”

《辞海》(1979年版)的历史意义在于,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,同时为今后的编纂积累了宝贵经验,比如既收单字、语词又收百科词条,培养比较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等。1981年1月,在一次主编会议上,夏征农与编委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共识,即未来的《辞海》确定“十年一修”,这是中国大型辞书的首创。“《辞海》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,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故纳新的问题。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,不适用了,大家不会去用,就可以去掉;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。吐故纳新,这是很重要的一条。”对于夏征农的这些观点,巢峰后来在《巢峰辞学论稿》一书中作了进一步阐释:“大型辞书如果不加修订,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。为什么1936年出版的旧《辞海》在解放后会失去使用价值,就是因为中国和世界、科学与文化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……为什么1979年版《辞海》也要修订,一来它是以1965年的‘未定稿’为基础,而‘未定稿’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,到80年代已有二十余年,有些学科不成体系,一部分百科内容,大大落后于时代现状;二是定稿时刚开始拨乱反正,虽然纠正了许多‘左’的东西,但终因没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,而许多冤假错案尚未平反,必然留下‘左’的时代烙印,只有隔一定时间修订一次,保证它的科学性、知识性,才能不断适应读者的需要。”

### 汇集中外古今 知识,借此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

——1989年版

“一切学问、文化都是有继承性的,同时它又受到历史局限性的限制,所以它一定会有缺点。因此《辞海》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提高,丰富充实。”在1987年1月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,夏征农谈了他对《辞海》(1989年版)的建议:“既不要乱戴帽子,乱贴阶级标签,也不要避而不谈,而是要讲得恰当……根据我们的情况,我认为可以不收在世人物。主要是考虑利弊问题、考虑影响。”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将上一版《辞海》的修订比作一次新的胜利,他同时也指出,新版《辞海》要把定义搞得更准确一些:“我们需要文化,我们的文化还不够……我们大多数人还谈不上一知半解,而



1989年版《辞海》

是模模糊糊的……我们的国家尚在发展之中,中外古今的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汇集起来,借此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。”

相比以往,《辞海》(1989年版)起点高、起步早,1984年就启动了编纂工作。“第一步化整为零,先出26本分册;第二步化零为整,即在分册的基础上汇编成合订本。”那个时期主持工作的是巢峰,在他看来,修订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健全。以社会学的词条为例,“未定稿”只有10多条,“1979年版”由于时间紧迫,担任分科主编的费孝通只能对原有条目进行修改,留下不少遗憾。这一次,依然是费老参与,社会学的收词数量增加到了367条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、法学等人文社科领域。自然科学则细化完善了不少分支学科,像电子技术学科下面增设了光纤技术、微电子技术、微波技术、电路与系统等,而数学的二级学科包括了概率论、数理统计等。

词目的设置逐渐趋于合理化,注重知识性和科学性,释文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,讲求第一手材料。徐庆凯、秦振庭合著的《辞海论》中提到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部名著《棠阴比事》,过去的版本是这样解释的:“法医学著作。宋代桂万荣编。计一册,72韵,144条。系根据《疑狱集》和《折狱龟鉴》两书内的事例写成。内容包括案情分析和实验方法,叙述简明扼要,用四字韵语,便于记诵。曾传至日本,被译成日文。”在编纂“1989年版”时,编辑们找来原书一看,发现错误太多了。这本书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案例汇编,涉及法医的内容很少,而“72韵”与“四字韵语”的说法也不对,并且只字未提明代吴讷对此书的修改。这些问题在“1989年版”中得以解决,经过修订的释文一直沿用至今。

继现有的笔画查字表、音序索引、外文索引和部首查字

法,《辞海》(1989年版)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(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发明),这是为了适应一部分读者的需要。“但是即使在当时,要用这个索引的读者也并不多。时至今日,为数就更少了。因此,第七版是否还要保留这个索引,很值得研究。”《辞海论》认为,这个索引的篇幅太大,像“2009年版”缩印本就占用了56页,“用这么大的篇幅,用来为很小一部分读者提供并非不可缺少的查检方便(他们不用这个索引也可以用其他索引来查检),显然不如用来为全体读者提供更多必需的知识”。

### 为我国辞书事业 树立起一座新的 里程碑

——1999年版

距离国庆50周年还有3年半,《辞海》的又一场战役打响了。1996年4月,分科主编会议在沪召开,群贤毕至。巢峰在报告中明确了《辞海》(1999年版)的目标:相比“1989年版”,要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,要有脱胎换骨的变化,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换代性的重点文化产品,从而为我国辞书事业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。

如何让世纪之交的“1999版”实现一次大的跨越?辞海编委会研究后决定,在保留配置线描图的普及本及其缩印本外,首次推出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。像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”、“清明上河图”这样的重要条目,只有附上彩色配图才能让读者更直观、也更准确地理解释文。为了征集新版必需的素材(总数为16000幅),辞书社成立了图片组,要求3年内完成收集、整理和编辑工作,用精美的彩图来颠覆过去“白纸黑字线条图”的传统样式。



1979年版《辞海》

(下转7版) →